

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
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
中山大學中華文化研究中心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主辦

第七輯

『華學』編輯委員會編

華學



中山大學出版社

香港大紫荊勳賢

饒宗頤教授米壽誌慶

吾輩出於

泰國潮安同鄉會暨諸鄉親（按姓氏筆畫排列）

丁身坤 王僑生 江再鑫 李基智 呂再寬
吳樹昂 林瑞潮 郭偉麟 陳少瑜 陳作龍
陳瑞雲 陳紹揚 陳家豪 陳家禮 許勝楷
許寶鐘 張榮柄 張遠發 蔡卓明 蘇岳章
蘇耀華 嚴吳舜卿 嚴娘賜

敬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華學·第七輯/《華學》編輯委員會編.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12
ISBN 7-306-02518-X

- I. 華…
- II. 華…
- III. 漢學-文集
- IV. K207.8-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7169 號

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地址:廣州市新港西路 135 號 郵編:510275

電話:020-84111998、84037215)

廣東新華發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經銷

南海系列印刷公司印刷

(地址:廣東省佛山市市東下路 6 號 郵編:528200)

850 毫米×1168 毫米 16 開本 21.5 印張 593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70.00 圓

如發現因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承印廠聯繫調換

目 錄

大學與大師	黃達人(1)
選堂先生與中山大學之夙緣	陳偉武(3)
治學遊藝七十春	
——賀饒宗頤教授“米壽”	曾憲通(6)
選堂訪古隨行紀實	經 法(13)
饒公與新古史辨	沈建華(35)
《“西南文化創世紀”——殷代隴蜀部族地理與三星堆文化》序言	俞偉超(40)
賡揚“四堂”又一“堂”——甲骨學五氏同“堂”	
——兼談古文字的破譯與釋讀	劉以煥(42)
饒宗頤先生與簡帛學	李均明(46)
哲人之書	
——讀選堂先生的書法有感	陳永正(57)
饒宗頤先生畫學淵源略論	章文欽(58)
論“選堂樂府”	劉夢芙(62)
十八、十九世紀潮州的家族經濟與士紳階層的价值取向	
——讀《潮安饒氏家譜》札記	饒春傑(78)
“九州平”及“地平天成”說	饒宗頤(87)
再論家譜刻辭	李學勤(89)
眉縣楊家村窖藏《四十二年逯鼎》銘文初探	周鳳五(93)
五祀馱鐘新讀	李朝遠(104)
山東秦國考	趙平安(117)
隨縣竹簡選釋	何琳儀(119)
由郭店簡《性自命出》的“室性者故也”說到《孟子》的“天下之言性也”章	裘錫圭(127)
說 榮	單周堯(136)
讀楚簡割記(二則)	曹錦炎(141)
郭店楚簡《老子》“絕智棄卞”解	郭鵬飛(145)

新蔡竹簡中的楚先祖名	賈連敏(150)
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彭祖》新釋	陳斯鵬(156)
上海藏簡第三冊《恒先》試探	黃人二 林志鵬(165)
讀上海藏簡第三冊零劄	陳偉武(174)
戰國秦漢文字同形刪簡現象研究	黃文傑(179)
東漢鎮墓文中所見到的“神藥”及其用途	劉昭瑞(191)
東漢的歌謠	胡守為(203)
唐會昌毀祆後的祆神祆祠與祆僧	姜伯勤(219)
沙洲歸義軍史事繫年示例	榮新江 余欣(223)
從姓氏看汪古馬氏的華化	殷小平(234)
元《竹西樓記》摩尼教信息辨析	林悟殊(242)
澹歸金堡與《元功垂範》關係考辨	何方耀(253)
論周文王的立國思想與西周禮樂制度	
——兼論文王與儒家文化的淵源	郭偉川(268)
讀三史《儒林列傳》札記	何廣棧(278)
“三言二拍”中與粵東閩語詞義相同詞語考釋(名詞篇)	林倫倫(285)
國家話語與移民社會的“分類意識”	
——以清代臺灣“義民”的研究為中心	陳春聲(293)
清初明遺民詩人棲遲韶關丹霞山史事綜考	潘承玉(306)
清代杭州城市管理與社會生活	
——以火政為中心的研究	謝湜(319)

大學與大師

黃達人

梅貽琦先生說：“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梅先生的話影響了幾代中國人。每當我們提到大學時，必然想到的就是大師。

大學的傳統，是由一代又一代大師的學術和精神傳統凝聚而成的，一所缺乏大師的大學，很難想像能夠成為人們心目中的名校。中山大學由孫中山先生於1924年親手創立，至今已在風風雨雨中走過了八十年的光榮歷程，作為中國南方的學術重鎮，在中山大學八十年的歷史中，有着許許多多蜚聲海內外的學術大師的身影，他們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不斷在科學技術領域和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探索前行，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輝煌成就。他們大多是各個學科的奠基者，其研究方法、學術成果、學術態度依然在中山大學的校園裏薪火相傳。大師們為中山大學奠定了良好的學風，豐富了“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學術傳統，積聚成為中山大學最為珍貴的一筆財富。

隨着中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山大學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在大學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大師們的深厚積累越來越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陳寅恪教授所倡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諄諄教誨，歷久彌新。大師們嚴謹求實的學風和開創學術新領域的勇氣，是後學者在各個領域積極探索的楷模。前人們給予我們的不是立竿見影的物質財富，而是無形且無窮盡的精神力量。好風憑借力，正是有藉於這種精神力量，學校在學科建設、學術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成就，煥發出勃勃的生機。

時光荏苒，我們迎來了中山大學八十周年校慶，為弘揚傳統，凝聚人心，塑造形象，建設精神家園，我校將舉行八十周年的系列慶典活動。慶典並非祇為了簡單的熱鬧，我們的目的，是要通過慶典回顧中山大學八十年的興衰變化，從而更多地瞭解這所大學的學術思想、學術成就和學術傳統，更是為了展望明天、建設未來。從大學的角度看，我們理應引導人們走向歷史的深處，思考這些歷史背後的意義，理出大學發展的脈絡，闡述大學一以貫之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是要發掘大師們在大學中留下的精神財富，這是中山大學的風骨所在，也是讓中山大學繼續屹立於祖國南方的精神原動力。

在慶祝中山大學創立八十周年之際，適聞另一件喜事：長期旅居香港的國際著名學者、中山大學名譽教授饒宗頤先生今年也將迎來八十八歲米壽之喜，這於我校而言，真是雙喜臨門。饒先生與中山大學淵源甚深，1935年，饒先生接受鄒魯校長的禮聘，擔任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藝文纂修一職；1993年，饒先生又兼任中山大學名譽教授及中山大學中華文化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因此，饒先生的喜事，自然也是中山大學的喜事。

饒先生曾經屢次提及中山大學對他治學生涯的影響。我以為，饒先生的成就首先來源於他對學術的專注和熱愛，幾十年如一日地耕耘勞作，遂能在人文領域寫下宏篇巨著，譽滿寰宇。此

外，大學與大師的命運，確是休戚相關。大師在大學的環抱裏，受人文傳統的熏陶，利用大學的有利條件，不斷攀登學術高峰，故可成其為大師。也因此，饒先生纔念念不忘中山大學，並不遺餘力地為中山大學作出種種貢獻。時至今日，前輩學術大師多已凋零，而饒先生猶如南山不老松，讓我們看到他老人家旺盛的學術和藝術生命力，也讓我們可以時時就教於先生，向他請教發展中山大學人文學科的妙計良方。

這又讓我對大學與大師的關係，有更深的體會：大學與大師之間，還有另一方面的內容，大師的存在，不僅可以使大學的聲名遠播，大師的精神和情懷，則更是大學作為研究學術的場所而異於其他機構的關鍵所在，所以，大學與大師之間，是相得益彰的。饒先生因為中山大學而踏入學術殿堂，而中山大學也因為有饒先生等學術大師的存在而得以光大其學術，延續其傳統。

因此，值此中山大學八十周年校慶及饒先生米壽大喜之際，我願借《華學》一角，向饒先生表示祝賀之忱，並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時也寄望中山大學的未來歲月精進開拓，再創輝煌，無愧於中山先生的英名，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驕傲。

選堂先生與中山大學之夙緣

陳偉武

饒選堂宗頤先生，1917年生於潮州，與中山大學素有夙緣，今年是中大八十周年校慶，欣逢饒公米壽之喜；喜上加喜，謹撰小文為賀。

饒先生家學淵深，天嘯樓藏書逾十萬卷，其尊人純鈞先生集學問家與詩家於一身，著述弘富，有《天嘯樓集》、《潮州西湖山志》行世。

饒先生十六歲作《優曇花詩》，耆老驚為神童，競與唱和。1934年，此詩與溫丹銘（廷敬）先生《廣優曇花詩》同刊於中山大學中文系《文學雜誌》第十一期。

同年，饒先生理董其先君遺著，輯補《潮州藝文志》，使成完璧，都五十六萬字。翌年刊於嶺南大學《嶺南學報》專號。

1935年，饒先生受校長鄒魯禮聘，任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藝文纂修，館址在文德路，先生居寓館中，容與優遊，博極羣書。考據家溫丹銘、冒鶴亭、洗玉清、李仲琴諸先生均於通志館任職。筆者近日屢訪廣東省檔案館，循覽戰前中大舊籍，檢獲1937年通志館人員名冊數紙，承有司惠允影印，姑附文末存參。

是年饒先生加入顧頡剛先生創立之禹貢學會。其時中大庋藏地方史誌居全國次席，饒先生治古輿地之學，頗得力於此。錢穆先生嘗謂屈原放居，地在漢北；《楚辭》所歌，本在江北。饒先生稽察羣籍，撰成《楚辭地理考》一書（194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同錢先生論難。

1936年，先生撰《廣濟橋志》，詳考潮州湘子橋數百年史料，於中山大學文科研究所史學專刊發表。同年，《海陽山辨》、《惡溪考》二文刊於北平《禹貢》雜誌第六卷第十一期。另有《顧影集殘本跋》、《書李文饒到惡溪夜泊蘆島詩後》二文，俱載於中山大學文科研究所語言文學專刊第一卷第二期。

1937年，先生撰《古海陽地考》，於《禹貢》第七卷第六、七期（古代地理專號）刊表。

1938年，承中山大學羅香林教授之囑，撰成《潮州叢著初編》，由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印行。10月，廣州淪陷，先生暫返潮州。

1939年，中山大學為避日寇凶焰，遷於雲南澂江。經詹安泰教授薦舉，中大研究院聘先生為研究員，先生應聘前往，途經香港因病羈留未就。

1949年後，先生移居香港。歷掌香港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教席，業績彪炳，著述綦豐。亦嘗講學於星洲、印度、日本、歐美，遊歷四大洲，聲名遠播海內外。期間同中大容庚、商承祚、詹安泰、洗玉清諸教授或投贈新著，或詩書酬酢，交誼篤厚，未嘗衰歇。

1979年9月，饒公在睽違故土三十年之後，首次重返大陸即來到中大，參加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次學術年會，論學揮毫，與學界舊雨新知把晤甚歡。會後吳南生先生邀請饒公多回內地旅行觀光。

1980年秋，先生赴成都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年會畢，由曾憲通先生陪同，行經十四省市，飽覽卅三博物館，暢遊名山大川，考察文物勝跡，凡三閱月。

1981年至1983年，先生邀曾憲通先生至香港中文大學合作研究，先後出版《雲夢秦簡日書研究》、《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與《楚帛書》三書。

1987年4月，饒公再次光降中大，在原教學樓（今數學樓）作學術講演，題為《四方風新義》，以殷商甲骨有關四方風及祈年卜辭同《四土頌》相證發，令人耳目一新。《四土頌》為近東開闢史詩，由饒公首次譯介成中文。講演辭經黃光武先生謄錄，刊於翌年第四期《中山大學學報》。

1987年12月，饒公在中大作關於敦煌曲之學術講演。

1988年，撰《敦煌石窟中的誡尼沙》，載於中山大學出版之《陳寅恪先生紀念論文集》。誡尼沙指智能與學問之神。

1990年，先生邀歷史系林悟殊先生至香港中文大學合作研究。

1991年，先生師法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義例，主纂出土史料繫年長編，邀中山大學姜伯勤先生至香港中文大學共襄盛舉。此後十年間，中大學人陳焯湛、劉昭瑞、陳偉武亦嘗赴港與其事。

1992年，林悟殊先生應饒公之邀，赴泰國華僑崇聖大學合作研究，歷時數載，1996年始返中大。

1993年，籌措編纂《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由曾憲通先生任編委會主任，中大文史哲諸系教師多有助編校之力者。此後饒先生數臨中大，商討文集編務。

同年，中山大學敦聘饒公為名譽教授及中華文化研究中心名譽主任。

同年，《饒宗頤史學論著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梓行，中大胡守為教授頗任選編之勞。1995年，先生籌募資金，創辦《華學》雜誌，由泰國華僑崇聖大學、清華大學與中山大學合編。《華學》迄今已出七輯，第一、二、五、七輯於中大刊行。

2002年，先生來中大參加詹安泰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會。

饒公詩詞書畫無不精絕，成就卓越，自有的評，中大“永芳堂”、“郁文堂”匾額及“郁文堂題記”，均出自饒公大手筆，鐵劃銀鈎，一字千金。

中山大學為南方人文淵藪，先生年方弱冠，躋身上庠，見重於碩學鴻儒，饒公幸甚，江山幸甚。先生之才，難以方量；先生之學，略無涯涘。以先生之身世才情，若久處板蕩家國，其是非成敗得失，未敢逆料也。天降奇才，復得奇緣，屢創奇跡，奇矣先生。方今紅塵擾攘，風習褻急，並世稱大師者夥頤。《周禮》有大師之官，掌六律，教六詩。而饒公業精六藝，博古通今，中西融貫，嘗深研曾侯乙鐘磬樂律，解讀敦煌琵琶譜，既善詩書畫，且雅擅鼓琴，真大師也。

請加蓋印章在姓名格內

(國立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 人員名冊 民國廿六年八月七日填

姓	名	年齡	性別	籍貫	學	歷	現在職務	任	所備考
溫	廷敬	六九	男	大埔	清遠省連州師範學校 私立國立廣東大學教授	纂修主任	本館		
胃	鶴亭	六五	男	江蘇 如皋	清舉人	纂修	本館		
陳	梅湖	五三	男	鏡平	法政學校畢業	編纂	本館		
張	俞人	五七	男	大埔	山東省青島市長 八里山東都督	黨務纂修	本館		
沈	玉清	三四	女	南海	嶺南大學教授	纂修	本館		
饒	聘伊	四一	男	大埔	上海法政學校畢業	教育纂修	本館		
黃	仲琴	五二	男	潮安	清時上海蘇法政畢業	金石纂修	本館		
蕭	漢棧	五六	男	大埔	韓山師範學校畢業	列傳纂修	本館		

饒	宗頤	二一	男	潮安	廣東省五中肄業	纂修	本館		
陳	鐵視	三十	男	潮安	國立中山大學文學士	文學院助教	本館		
杜	結全	三七	男	東莞	廣東高師師範畢業	文學院助教	本館		
何	乃文	二七	男	大埔	國立中山大學法學士	法學院助教	本館		
李	杰	二八	男	南海	國立中山大學理學士	理學院助教	本館		
吳	漢光	二九	男	澄海	國立中山大學理學士	理學院助教	本館		
尹	柱顯	二八	男	潮會	國立中山大學理學士	理學院助教	本館		
溫	克瑤	二七	男	大埔	大埔中學畢業	採訪員	本館		
李	介丞	五八	男	豐順	清附生	潮梅採訪員	本館		
陳	鵬	二二	男	潮安	汕頭市五中畢業	繕校員	本館		

請加蓋印章在姓名格內

(國立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 人員名冊 民國廿六年八月七日填

姓	名	年齡	性別	籍貫	學	歷	現在職務	任	所備考
陳	經倫	二九	男	潮陽	上海中國公學文學士	事務員	本館		
張	運之	四七	男	大埔	潮州金山中學肄業	書記	本館		
張	維生	二六	男	大埔	大埔縣立一中畢業	書記	本館		
丁	之輿	三十	男	豐順	上海震旦大學肄業	書記	本館		
吳	惠卿	二七	女	曲江	廣東省立女師畢業	書記	本館		
蔡	雪珠	二七	女	福建 廈門	廈門勸業女中畢業	書記	本館		
郭	照巖	四八	男	潮安	上海法政學校肄業	書記	本館		
黃	策	二五	男	潮安	汕頭時中學畢業	書記	本館		

張	麗玉	二六	女	大埔	大埔縣立一中肄業	圖書管理員	本館		
---	----	----	---	----	----------	-------	----	--	--

治學遊藝七十春

——賀饒宗頤教授“米壽”

曾憲通

饒宗頤教授乳名福森，字伯濂，又字伯子、固庵，號選堂，是海內外著名的史學家、經學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文學家和書畫家，又是出色的翻譯家。香港大學、香港嶺南大學、香港公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名譽文學博士，法國索邦首位榮譽人文科學國家博士。歷任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法國科學中心、法國遠東學院院士。哈佛大學多次訪問學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教授，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首任教授，耶魯大學、法國高等研究院宗教部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學及人文科學研究所客座教授兼講學九州大學、北海道大學。現為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韋倫講座教授及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講座教授、顧問，主持出土文獻研究計劃，香港大學中文系榮譽講座教授。1962年獲法國漢學儒蓮獎，1980年被選為法京亞洲學會榮譽會員，1993年獲法國政府頒授文學藝術勳章。現兼任國內外多間高等學府及學術機構顧問，諮詢委員、名譽教授及研究員。2000年7月作為香港學術界的傑出代表獲香港特首親自頒發的大紫荊勳章。2001年獲聘為北京亞歐科技學院院士，等等。

(一)

選堂先生1917年6月生於廣東潮安。父親饒鏗（純鈞）博學多才，工於詩文，精於考據，尤擅譜志，著有《佛國記疏證》（稿）及《潮州西湖山志》。所建天嘯樓是粵東最負盛名的藏書樓，家藏典籍積至十餘萬卷，是潮州有名的藏書家。選堂先生幼承家學，聰穎過人，詩詞書畫琴藝，初試即露鋒芒，故早享神童之盛譽。16歲咏《優曇花》詩，一時驚諸老宿，競與唱和。弱冠之年即為其父整理遺著《潮州藝文志》，刊於《嶺南學報》。1935~1937年受聘為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專任纂修，1939年8月應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當年中山大學遷校雲南澂江，先生取道鯊魚涌擬經香港赴滇，因病滯留香港。留港期間為王雲五主編的《中山大詞典》撰古籍篇名提要稿，又佐葉恭綽編定《全清詞鈔》初稿，並完成《楚辭地理考》等著述。1941年返潮州。1943年赴廣西桂林，任無錫國學專科學校教授至1945年，其間兩度深入大瑤山。1946年被聘為廣東文理學院教授。1947至1948年出任華南大學文史系教授兼主任及《潮州志》總編兼廣東省文獻委員會委員。1949年為《潮州志》之編寫赴港諮詢並工作。在此期間，先生著述甚豐。但其時正當日寇侵華之艱難歲月，生活顛沛流離，故積稿多未刊行而散佚殆盡，僅存流寓粵西所作之《瑤山詩集》，殊感可惜！先生早歲見重於顧頡剛教授，由顧老邀約編著新莽史及《古史辨》第八冊（古代地理），均因戰亂未及印出，其目錄載於《積善》半月刊（齊魯大學印行）。

1952~1968年，先生先後任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高級講師、教授，主講詩經、楚辭、漢魏六朝詩賦、文學批評及老莊等專題。課餘則從事古代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在此期間，先後出版了《楚辭書錄》（1956年）、《楚辭與詞曲音樂》（1958年）、《九龍與宋季史料》（1959年）、《詞籍考》（1963年）、《潮州志彙編》（1965年）、《香港馮平山圖書館善本書錄》（1970年）等。與此同時，先生更注重於新發現材料的整理與探究，如《韓江流域史前遺址及其文化》（1950年）、《從考古學上論繪畫的起源》、《長沙楚帛書山鬼圖跋》、《戰國楚簡箋證》、《者汜編鐘銘釋》、《居延零簡》、《京都藤井氏有鄰館藏敦煌殘卷記略》、《金匱室藏楚戈圖案說略》（1956年）、《長沙楚墓時占圖卷》、《帛書解題》（並1954年）《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1956年）、《日本所見甲骨錄》、《巴黎所見甲骨錄》（並1956年）、《長沙出土戰國繒書新釋》（1958年）、《海外甲骨錄遺》、《殷代貞卜人物通考》（並1959年），等等。這一時期，先生對敦煌學、甲骨學、楚帛書用力最勤，創獲良多。如《敦煌本想爾注校箋》考定《想爾注》成於張魯之手而托始於張陵，對道教史研究有重要意義，它引起歐洲人對道教研究的興趣，成為後來漢學界之道教狂熱。此書在國際上負有盛譽，被巴黎研究院定為教材。《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開創了以貞人為綱排比卜辭的先例，在理論和方法上都超越前人，對瞭解各個貞人的占卜內容及其所屬的時代很有參考價值。此書一出，共有十三個國家和地區發表評論並加以推介，足見它在中外學術界影響至鉅。先生在《殷代貞卜人物通考》一書刊出之後，與印度友人白春暉（V. V. Pahanjepe）交換，從其學梵文三年；1963年，遂應班達伽（Bhandarkar）東方研究所之聘，前往天竺古梵文研究中心之蒲那（Poonā），從事中印關係之研究。復從 V. G. Paranipe 老教授學習梨俱吠陀（Rig-veda），足跡遍及印度南北。歸途遊歷錫蘭、緬甸、泰國、柬埔寨各地，所到之處，尋幽搜秘，別有《佛國詩集》紀遊。先生後來從事“東方學”研究，其梵學知識即植基於此。1965年，先生在紐約楚帛書藏主戴潤齋處獲睹帛書原物，積疑冰釋，因寫成《楚繒書十二月名跋論》（1965年），證成帛書圖像首字即《爾雅·釋天》十二月名，遂成定論；又據楚帛書紅外線照片作《楚繒書之摹本及圖像——三首神、肥遺及印度古神話之比較》及《楚繒書疏證》（並1968年），把楚帛書研究推向新的階段。

1968年至1973年，選堂先生應新加坡國立大學之聘，任該校中文系首任教授兼系主任。教學之餘，先生專事搜求當地華文碑刻，《星馬華文碑刻繫年》（1972年）和《新加坡古事記》二書，為華僑史研究增添了極其珍貴的資料。還刊行《歐美亞甲骨錄存》（1970年）。前度在法京與法國漢學大師戴密微（pandani eville）教授合著《敦煌曲》（於1978年在巴黎出版），為敦煌寫卷詞曲之集大成者，在敦煌學研究上具有特殊的意義。選堂先生對敦煌卷子十分重視，並用以進行多方面的研究。除上述《想爾注校箋》外，尚有不少專論，多有發明。如從敦煌《通韻》中對四個梵文字母（R、R、L、L）的不同譯法，研究唐人作佛教贊歌時的“和聲”；從宋初開寶七年（974）十二月十一日的批命本子，研究七曜與十一曜的關係，闡明了古波斯占星學對中國古天文學的影響。皆發人深省。由於先生曾留學印度梵學研究中心攻治婆羅門經典，通曉梵巴諸語文，因而能够揭示劉熙《釋名》淵源於婆羅門經《尼盧致論》（Nirukta），韓愈《南山詩》實受馬鳴《佛所行贊》（Buddha-Carita）的影響。所有這些都是前人未發之覆。先生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執教期間，還兩度外出講學，其中1970~1971年為美國耶魯大學客座教授，1972~1973年為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教授，均有不少力作。

1973年9月，先生重返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旋又兼系主任，直到1978年9月退休。這一時期，印行在美國所著《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1977年）及在法京巴黎編著之《敦煌白畫》與《敦煌本文選》（並1978年）二書，為敦煌學研究增添異彩。過去研究敦煌繪畫

的人往往祇注意壁畫和絹畫，先生獨具匠心，他將在寫卷中的白描、粉本、畫稿等研究敦煌畫極重要的材料輯出，編成《敦煌白畫》一書，有圖有說，使沙洲畫樣的來歷得以闡明，從而填補了敦煌研究中的一項空白，進而融入自己的畫作中，使人物、線條極具獨創性。還出版《黃公望及其富春山圖》等，此外尚有大批手稿待刊。1976年先生第三次位法京巴黎，在遠東學院工作。除繼續研究敦煌經卷外，還遍讀沙畹當年在華搜集所得的全部金石拓本，遂有《唐宋墓志》之作。復以暇日從J. bottero教授治楔形文字，正式接觸西亞文史知識與遺物。先生後來從事比較古文字學的研究即淵源於此。

選堂先生榮休後並未離開教席，繼續在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澳門東亞大學擔任榮譽教職，並培養研究生。1978~1979年，在法國高等研究院(L'E'coie Pantigue clis E'tucles)第五組宗教部門任客座教授一年。1980年，任日本京都大學及人文科學研究所客座教授五個月。1980年初冬，先生到成都參加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三屆年會後，即到內地參觀考察。筆者有幸作為廣東省高教局派出的隨員一路陪同。此次歷時三個月，先生行踪遍及14個省市的許多博物館和考古文物單位，飽覽了祖國的名山大川，接觸到大批新出土的考古文物資料，興奮異常。11月中，先生在湖北省博物館參觀，看到展品中有曾侯乙墓出土衣箱漆書20個字的摹本，盡是古文奇字，尚無釋文，不明句讀。譚維泗館長請為試釋，先生經過一番琢磨，終於寫出：“民祀佳坊(房)，日辰於維，興歲之四(駟)，所尚若陳，經天嘗(常)和”20個字。聞者無不折服。隨後又寫成《曾侯乙墓匱器漆書文字初釋》一文，詳加考證，刊於《古文字研究》第十輯(1985年)。在武漢時，先生有感於新出資料的重要，又得到湖北省博物館的支持，便與筆者商定以“楚地出土文獻研究”為課題，回港後即邀筆者共同完成《雲夢秦簡日書研究》(1982年)、《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和《楚帛書》(並1985年)三部著作。前二書被譽為研究秦簡日書及振興中國鐘律學的奠基之作；後一種則是楚帛書出土四十年來最新成果的彙集和全面的總結，對推動楚帛書的研究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實際上，先生榮休之後，由於擺脫了日常行政雜務，更加自由自在地雲遊四海，更能集中精力於學術的探討與著述，故自80年代以來，又有多種著作相繼問世，除上面提及之外，還有《唐宋墓志》(1981年)、《選堂集林·史林》(1982年)、《虛白齋書畫錄》、《敦煌書法叢刊》29冊(並1983年)以及《固庵文錄》(1989年)等，都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90年代初期，先生一方面開始着手編纂《饒宗頤二十世紀文集》，準備對自己的學術研究作一番全盤的清理和總結；一方面仍繼續醉心於開拓新的學術領域，碩果累累。舉其要者，如《中印文化關係史論集——悉曇學緒論》、《敦煌琵琶譜(編)》(並1990年)，《詞學秘籍之一——李衛公望江南》、《老子想爾注校證》、《文轍——文學史論集(上、下)》(並1991年)，《詞集考——唐五代宋金元編》(1992年)，《廣濟橋史料彙編》(與張樹人合編著)《畫韻——國畫史論集》、《梵學集》、《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與曾憲通合著)、《法藏敦煌書苑精華(編纂)》、《饒宗頤史學論著選》(以上並1993年)，《新加坡古事記》(1994年)，《新莽簡輯證》、《敦煌漢簡編年考證》(並與李均明合著，1995年)，《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韓文譯本)、《饒宗頤潮汕地方史論集》(黃挺編)、《澄心論萃》(胡曉明編)、《敦煌曲續論》(並1996年)，《文化之旅》(1997年)，《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1998年)，《清暉集》(1999年)，《甲骨文通檢》(主編，共五鉅冊，1989~1999年出齊)。此外還主編《華學》雜誌和主持以地下出土資料補資治通鑑史料之長編稿系列。前者自1995年至今已出版六輯，後者也有多種《出土史料繫年長編》問世，拳拳大觀，在學界深有影響。此一時期，先生雖年逾古稀，依然懷着一顆勇於繩幽鑿險的童心，在諸多領域中不斷地開拓創新。試舉三例說明之：

《近東開闢史詩》全文用楔形文字刻於七大泥板之上，是一部記載阿克得人開天闢地的神話

文獻，上半部記述天地開闢之初諸神之間互相爭鬥，後來纔產生出太陽神馬獨克（Marduk）。下半部敘述馬獨克安處宇宙間，由三位最高神明（Anu, En-lil 及 Ea）興建巴比倫神廟的經過，以及他們如何從反叛者身上瀝取血液來創造人類的創世故事。饒先生第一次將這部楔形文字譯為中文，並以書中之宇宙論與《淮南子·天文訓》、彝族宇宙論和古代楚人的天道觀詳細加以比較，進而指出近東和遠東兩個地區開闢神話和造人神話的異同，這在世界比較神話學上具有重大的意義。由於此書饒先生用鏗鏘典雅的文言文翻譯，讀起來韻味無窮，令人叫絕，堪稱翻譯史上之傑作。此書已經由遼寧出版社作為新世紀萬有文庫之一種在國內出版。

《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是先生最新的研究成果之一。書中利用考古發現的陶符和圖形文，融會民族學的若干資料，從多角度追溯漢字演化的軌跡，探索原始時代漢字的結構和演進的歷程，說明文字起源的多元性及其與地區分布的交互關係，並與腓尼基字母、蘇美爾線形文等古文字作比較研究。指出中國歷來統治者施行以文字控制語言的政策——“書同文字”，致使語、文分離，文字不隨語言而變化；而且漢字結合書、畫藝術與文學上的形文、聲文的高度美，造成漢字這一枝葉蔥蘢、風華絕代的大樹，卓然兀立於世界文化之林。而文字、文學和書法藝術的連鎖效應，則構成漢文化的最大特色。進而揭示漢字在未成形的初期，陶器上大量的線性符號多與腓尼基字母相似，類似於西亞早期的線性圖文。作者認為，古代閃族人在使用字母時，曾經嘗試過採擇彩陶上的符號來代替楔形文字的雛型字母，從而提出了具有原創性的字母出自古陶文的“字母學假說”，成為比較古文字學一個極其重要的命題。

《甲骨文通檢》是一部大型的甲骨文分類索引，具體編纂由沈建華負責，先生於每冊均撰有長篇的“前言”，闡述與各分冊相關的甲骨學問題。第一冊“先公、先王、先妣、真人”，第二冊“地名”，第三冊“天文氣象”，第四冊“職官人物”，第五冊“田獵”。這些基本上總括了卜辭內容的所有類別。先生於每類幾乎都有新的發現和獨到的研究心得。如“地名”一項，先生發現《史記》祇有“河渠書”而沒有“地理志”，但通過甲骨文通檢的編著，計得商代地名總數 1100 多個，又運用史籍文獻對勘的方法，對《夏本紀》禹後以國分封諸姓之地名作具體研究，從甲骨文中揭示並復原禹後地名構成的規律。又如，卜辭中有帝乙征伐人方的記載。但關於人方的地望，過去因受王國維、董作賓的影響，以為不出於黃河流域。選堂先生根據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和相關的歷史記載，將人方釋為夷方，定位在現今陝西及西南一帶，大大地超出以往研究的地理範圍，這不但極大地擴大了殷商時代的版圖，而且對於西南地區的開發年代和文明程度也有極其重要的研究價值。

(二)

以上我們把選堂先生的生平和學術著作按五個時期作了粗略的介紹，從中可以看出，先生的學術活動和學術研究的範圍非常廣泛，涉及人文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根據先生自己的歸納，其著作可分為敦煌學、甲骨學、詞學、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含金石學）和書畫等八大門類。每個門類先生都細緻深入地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並有重要的建樹。縱觀先生六七十年來的治學道路，大抵早年以攻治地方文獻為主，中年以後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獻，大有創獲；壯年由中國古代的研究擴展到人類文化史的研究，晚年興趣逐漸轉移到印度和西亞，填補了中國學術史上不少空白。其成果則以開創性及文獻整理開路為多。關於選堂先生的學術成就，當代東方學大師季羨林先生在《〈饒宗頤史學論著選〉序》中分別從“地下實物與紙上遺文”、“異

族古書與吾國舊籍”、“外來觀念與固有材料”三個方面作了高度概括。本文僅據筆者的一孔之見，試就選堂先生的治學特點略作補充。

先生治學，可以“博古通今，東西融貫”八字當之，先生自幼於中國傳統文獻（包括經史子集）早已熟諳在胸，又長期研治甲骨文、金文及戰國秦漢文字，故對地下發現的新材料皆隨手拈來，左右逢源。加上通曉英、日、德、法等國語文及印度、巴比倫古代文字，這些使其在原始材料的占有和運用上具有無上的優越條件。打開先生的著作，幾乎每一種書都有一個自成體系的資料細目。作者的許多真知灼見就是從這些翔實的材料中演繹升華而來的。先生羅致材料可謂不遺餘力，概括言之，時不分古今，地不擇內外，取材不拘巨細，從新石器的陶片到現代科學的資料，從亞洲近東直到歐美各地的史實，祇要與論旨有關，概在搜羅之列。讀先生書，無不為其旁徵博引及系統剖析的淵博學識所折服。

其次，先生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根柢，又旁通西方治學的門徑，故能認清時代學術的潮流，踴躍投身其中。從中國學術發展史的角度來考察，20世紀初至90年代，正是中國學術處於“信古一疑古一證古”的轉型時期，在先生從事學術研究和學術活動的七十年中，一直置身於每個時代潮流的最前列。當今被稱為世界顯學的敦煌學、甲骨學、簡牘學，以及中外關係史等，先生都不失時機地利用新出土的資料，致力於證古和釋古的工作，努力開創新局面，並不斷取得令人矚目的新成果。對於某些比較複雜然而具有重大研究價值的論題，先生一方面運用前代樸學治經治史的經驗，深入闡明研究對象的內涵，同時又從人類文化史的高度，追根溯源，揭示研究對象的本質及其演變的規律，即從微觀入手以窺宏觀，故能極盡抉微發幽之能事，發前人之所未發，令人耳目一新。

先生治學的第三個特點是，通過多種學科的互相滲透和交融，積極開拓交叉學科的新領域。從先生的論著中可以看到，有不少論題是幾個相關學科之間的交叉學問，過去很少有人注意，更無人做過深入的探討。先生憑藉他那淵博的學識和過人的才思，縱橫馳騁，常常有獨到的發現，如由卜兆記數推究殷人對於數的觀念；用滇蜀出土的故事畫擬測屈原所見先王祠廟的壁畫；從唐代石刻論述武后之宗教信仰；由《齊書》之昆侖船論證海道之絲路並不亞於陸路；利用湖南寧鄉出土的人面方鼎推測楚地信奉黃老之學由來已久；由馬王堆《老子》後佚書論證五德終始之說實起於子思而非鄒衍。凡此種種，都是先生巧妙地運用多種學科的相關知識，近搜遠討，反復鉤稽，可謂得心應手，令人信服。

在國際會議上，先生時有精警言論，匡正一般誤解，如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召開的楚帛書研討會上，有人懷疑它是後人偽作的贗品，先生列舉若干鐵證，指出其疑所不當疑，是第一個指證楚帛書為確鑿可信的學者。在法京世界文字會議上，提出《漢字與詩學》的論文，糾正 H·Poud 對漢字偏重象形的錯誤；1986年9月，法國高等研究院宗教部慶祝一百周年紀念，舉辦世界禮學會議，先生提出《〈春秋〉中之“禮經”及重要禮論》，指出“禮”字的宇宙義，不能僅僅看成禮節，把它譯成 Ritual 並不妥當，足見先生對經學之理解精細入微，造詣高深。

要之，先生治學嚴謹而不拘泥，淵博而虛懷若谷，著作宏富而又汲汲於求新，故能高蹈獨步，無往而不利。

（三）

選堂先生在駢文、詩詞、書畫方面也有卓著的成就，不過為學術所掩，不大為人所深知而

已。先生足跡，九州行其八，五洲歷其四。舟車所至，探奇訪勝，輒以詩詞記事抒懷；時為自注，考事徵文，蔚為大觀。論者以為先生以學人而有才人之詩，詩中有史，極具特色。1978年，《選堂詩詞集》印行，輯有《選堂詩存》13種，《選堂樂府》4種，即為其代表之作，而其中《黑湖》諸集已譯成法語，宇內共賞，聲名遠播。至其所作儷體文尤為出色，在其近刊《固庵文錄·儷體篇》中，收錄駢文共40篇，“沉博絕麗，比之清人，惟孫星衍、凌廷堪可相匹敵。”（陳槃《書後》語）至於翻譯文字，典雅莊重，鏗鏘可以上口，於譯吠陀無二頌，可以見之。其《近東開闢史詩》，為漢文第一部譯著，尤盡創闢之能事。1999年，作為先生韻文、駢文創作合集的《清暉集》印行，內中“韻文集”收賦13篇，詩17種，詞6種；“駢文集”收頌、贊、銘、文、序等30餘篇。先生在《跋》尾中說：“余半生行役，五洲已歷其四。所到之地，多模山範水之篇，既寄心於無垠，聊密爾以自適。所作賦、詩、詞三類，皆韻文之屬；間亦取則伐柯，偶為儷體。……茲總彙各稿，統名曰《清暉集》，以山水之作獨多故也。”季羨林先生為本書作《序》云：“選堂先生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世界五洲已歷其四；華夏九州已歷其七；神州五岳已登其四。先生又為性情中人，有感於懷，必發之為詩詞，以最純正之古典形式，表最真摯之今人感情，水乳交融，天衣無縫，先生自謂為詩人開拓境界，一新天下耳目，能臻此境界者，並世實無第二人。”

在書畫藝術方面，選堂先生也早有淵源。先生6歲即開始用毛筆寫字描畫，喜歡描繪各種人物，尤其喜歡畫佛像。12歲正式從師，學習山水、花鳥、人物技法；師宗任伯年，曾將任氏作品通臨一遍。至17歲，他寫任派作品已可達到操縱自如的地步，為日後畫藝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此後又對中國傳統繪畫作窮幽探蹟的研究。五六十年代，先生畫風受南宗黃（公望）倪（雲林）、北宗馬（遠）夏（珪）影響最深，擁有南派的渾厚華滋和北派的奇雄蒼勁；70年代以後，先生之山水技法轉向多元，上自宋代李唐、郭熙，下至清初四僧（石溪、石濤、八大、弘仁）和張風等，兼收並蓄，逐漸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白描人物畫則充分吸取敦煌白畫（壁畫畫稿）的精髓，深得國畫大師張大千的贊賞。先生書法初習漢隸，後臨魏碑，繼以碑法入行草，故其書清超醇雅，工麗雋妙。復規摹甲骨、鐘鼎、帛書、簡牘及歷代名跡，篆隸兼施，古樸雄渾，別具一格。先生以書款寫詩入畫，使詩情畫意融成一體，相得益彰。說者謂先生之書畫特點可以妙、雅、新三字概括。妙指題畫詩文雋妙；雅指書法醇雅；新則是畫法生新、畫意清新。可見先生不但詩、書、畫三者兼長，而且已經達到很高的藝術境界。1978年，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為先生舉辦書畫展覽於香港大會堂，並印行《選堂書畫集》。此後又在新加坡、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等地舉辦了一連串書畫展覽，獲得了巨大成功。1986年，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舉辦“饒宗頤教授從事藝術/學術活動五十周年紀念——七十大壽書畫展”，氣魄十分雄偉；山水與題句交輝，法書則衆體競美。1989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饒宗頤書畫集》。1991年，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主辦“饒宗頤書畫展”；1992年，香港藝苑出版社出版《選堂書楹聯初集》和《饒宗頤翰墨》；1993年，在廣東畫院舉辦“93廣州饒宗頤書畫展”，並由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出版《饒宗頤書畫》；1994年，由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央美術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畫研究院聯合舉辦“饒宗頤書畫展”於北京中國畫研究院展覽館，一時轟動京華藝壇，好評如潮，聲名大振。1999年，澳門基金會以澳門市花——荷花為主題，舉辦“清涼世界——饒宗頤書畫展”，同時出版《清涼世界書畫集》。2001年10月，中國歷史博物館舉辦“古韻今情”饒宗頤書畫展，同時出版《古韻今情》書畫集；選堂先生特創作十八尺水墨荷花巨幅致贈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不難想像，廣大書畫愛好者從這些接踵而來的“書畫展”和目不暇接的“書畫集”中，一定可以盡情領略先生的詩之情、畫之意、書之態、印之姿，或許會驚嘆先生的

藝術造詣並不在學術之下的。

饒宗頤教授是位學富五車、著作等身而又多才多藝的學者兼藝術家。數十年來，先生足跡遍及世界的四大洲和神州大地，寫下了五十多部著作和四百多篇論文，總計達一千萬字以上，此外還有無數的書畫佳作，是當今集學術與藝術於一身的一代英才。目前，饒宗頤教授的家鄉——潮州市和饒教授工作過的香港大學都分別建有“饒宗頤學術館”，以彰顯先生的生平業績及其對人類學術和藝術所作的卓越貢獻；而集先生著作之大成的《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最近也由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式出版和發行。文集分 14 類 20 冊，洋洋大觀，人們可以從中領略饒宗頤教授七十年治學遊藝的發展歷程。值此饒公屆臨“米壽”之際，我們衷心祝願饒公這棵南山的不老松“四季常青”，“童心永駐”，繼續為繁榮中國的學術和藝術作出貢獻。

2003 年 12 月增訂